

《论语》与现代中国

——阐释及建构

章一十

蔡節編

李健胜 著

本书的研究不仅填补了《论语》现当代阐释史的学术空

白，在“国学热”的时代背景下，本书也可以帮助人们深化对传统经典及其现代价值的认识。

人民出版社

《论语》与现代中国

—— 阐释及建构

李健胜 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刘智宏 文 汇

封面设计:阳洪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与现代中国:阐释及建构/李健胜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01-011535-1

I. ①论… II. ①李… III. ①《论语》-研究 IV.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6274 号

《论语》与现代中国:阐释及建构

《LUNYU》YU XIANDAI ZHONGGUO:CHANSHI JI JIANGOU

李健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18 千字

ISBN 978-7-01-011535-1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2008年,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推荐曾任他学术助手的李健胜跟我读博士,令我受宠若惊。见面认识以后,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健胜1997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2004年又在辽宁师大赵玉宝先生那里获得硕士学位,入校前已有副教授职称,且出版过《先秦文化批判思想研究》、《子思研究》两部著作,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这样有基础、有积累的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按时毕业。忧的是:他所研究的思想文化史是我不常涉足的领域,我能够指导得了吗?

果然,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健胜报来的题目便让我犯难。《〈论语〉与现代中国:阐释及建构》,不但跨度大,连是否属于先秦史方向都有些吃不准。

急忙去同臧振、袁林、王晖、商国君诸教授商量,经反复讨论,最后达成了共识。大家认为:与“文革”中的急于参与政治相反,当下的史学工作者多不关注现实,所作的东西虽然学术性强,但只可供少数人把玩,广大群众不理解,史学的致用功能已在削弱,并有自我边缘化的倾向。现在,健胜愿意力矫时弊,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不支持他一下呢?于是,他的这个题目在开题时就被通过了。

不出所料,论文初稿刚经过导师组传阅,大家即感到耳目一新。后来,又得到外审专家的好评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肯定。如今,健胜将修改过的稿子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相信此书的发行能为新时期的学术百花园增加一份芳香,并对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产生助力。

健胜以史料为依据,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梳理了《论语》及其文本定位的流变,评述了不同学派、不同学者对《论语》的解读,从而凸显了《论语》在现当代中国诸领域内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具体而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追求现代化

的思想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健胜这本书既是一部《论语》阐释学史,又是一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

“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态度”,是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精神和理想。由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已经沦为“东亚病夫”,所以,一向具有忧国忧民传统的知识分子大都渴望尽快走出被歧视、被殖民的泥淖,建设幸福、美好的现代化明天。从健胜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派请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鼓吹民主与科学;而所谓的现代新儒家,从熊十力到徐复观、杜维明、林安梧,等等,也无不对自由、民主、平等诸进步理念怀抱强烈的追求,更不待说素有民主旗手之誉的余英时了。健胜的字里行间中,跳动着的是——一颗颗纯良、执着而有血性的心。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思想流派,首先需要的是理解、同情和宽容,而不是给先贤时彦分别戴上激进主义、科学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帽子。就这一点而言,健胜的处理可谓恰到好处。

然而,现代性又是一场“未完成的设计”,而“自我理解”和“自我依据性”实际上成了把握现代性的两个重要向度。每个人的出身、经历、学养千差万别,难免会对现代性产生不同的认识。胡适作为第二批享受庚款奖学金的留学生,在美一住七年,对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结构及选举系统倍感新奇和兴奋,对竞选总统的大会居然可以由一位工友来主持的民主精神,更是神往之至;反躬自省,发现已变成死工具的古文不独不利于文学传播,更无法唤起民众、走出愚昧,故而始倡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这样的深刻体会相信熊十力或钱穆们不会有。到今天,一些久居港台或海外的学者对所谓现代病反映敏锐,加之与异质文化终存隔膜,因此大发思古之幽情,试图从中国典籍中寻求疗救世界的药方,其潜在的原因,也恰在他们对曾腐朽发酵于整个大陆的专制余毒缺乏切肤之痛。《荀子·解蔽》篇曰:“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固然应该抱着同情的态度,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思想流派“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又不能不承认,无论是哪一派,都存在着“不该不遍”的弊端,“皆一曲之士也”。五四新文化派认为,孔、孟之道已不合于现代生活,固守原有价值理念的做法必须改变。现在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被斥为蔑弃祖宗、轻视传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断裂。其中某些分析或有一定的“解蔽”作用。但这是否意味着现代新儒家的学说就“壁立千仞”、崇高无限了呢?看了健胜的书,您就会明白,要

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相当困难的。例如：熊十力认为《论语》中蕴含着改革、民主、平等、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现代意识或政治理念；钱穆说，“孔子所开示者，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南怀瑾把儒学比作粮食店，把西方文化比作洋面包，强调粮食“不可一日不吃”，而洋面包吃多了胃会出毛病；徐复观视儒学为可以通约于民主、自由的“先见之明”；杜维明把《论语》比作《新约》，把孔子看成耶稣；毛子水坚持“《论语》乃世界第一”；林安梧提出“儒家型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甘阳要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等，充其量也不过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对于这样一些既无文献学依据又不作历史分析的、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妙道高论，难道也非要人们“以自己的全幅投入”去作他的“信徒和崇拜者”吗？现代新儒家应当清楚，尽管他们自称已经历了三代，“在沟通儒学与现代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效果并不大，影响的范围十分有限。

我们当然知道，现代新儒家尊崇孔子，抬高《论语》，有着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良好愿望，钱穆、徐复观等人主张以恢复民族创造性作为现代化的基点，的确有利于国人更理性、更客观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任何道德、观念的产生都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适应，要从服务于上古农业社会的旧思想中开出具备现代理性的“新”来，岂非缘木求鱼？所以，无论是“嫁接”还是“转换”，现代新儒家都无法做到得心应手。正如健胜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或对典籍“按己意简择”，凡不合口味者，皆斥之为伪，骂其为奸；或对颇有争议的语录做出“合理化解释”；更丝毫不顾孔子言说的历史语境及局限性，硬要将其视作贯通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用学术的眼光审视，这些做法不独十分勉强，而且已失之于主观武断，实际上与宋儒以内圣外王之道重构经典的故伎十分相似，始终未脱“六经注我”的窠臼。不过，现代新儒家之所以难于服人，除了方法上的缺陷之外，可能更在学理上存在障碍。以鄙人浅见，他们起码有两个坎儿很难逾越。其一，真理究竟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如果承认每一时代的真理只有相对性，属于相对真理，那么，世界上是否存在大家必须永远顶礼膜拜的“万代师表”？其二，一般寓于个别，个别是一般中的个别，没有一般就没有个别。每一个个别固然都不同于一般，但是否能用个别的特殊性来抹杀一般或代替一般？对这些问题绕着走是不行的。要是提不出好的解释，其学说便仍等于建在沙滩上。

现代新儒家注重“内圣”功夫,认为内在德性的培育和完善既是儒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途径。如果宣传、运用得当,此说在慰安人际、健康身心、稳定社会方面,或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众所周知,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与“德”联系紧密的“仁”,还有一个“礼”。近年来,尽管对“礼”的解释新见叠出,玄而又玄,却始终无法否认,等级制度就是“礼”的本质和核心。在《论语》中,孔子就曾明确表示,严肃“君臣父子”的等级界线乃为政之要。齐景公闻此心领而神会,大加叹赏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还反复强调:“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这些都集中反映,提倡礼的目的重在使民敬上、易使和弗叛,或如荀子所总结的,是为了“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从而使儒家向往的以层级结构为骨架的秩序型社会得以存续。历史地看,如果老是男女无别、父子无别、君臣无别,可能很难进入文明。故而,等级制度的确立在促进人类进步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不能低估。但以与时俱进的眼光观察,则又必须承认,这种制度不仅在娘胎里就带有“损卑幼以奉长上”和压抑人的个性的严重弊端,而且早就成了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因为现代民主坚信普遍沟通的可能性,认为可以通过谈判、妥协和让步来调整人际关系,而不是诉诸强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道德上的前设,即人类都以自由人和平等人的身份相处,有关双方都给对方以尊严。只有如此,才能有心灵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否则,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谈判都不会成功。试想,在这样的以人与人的平等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中,坚持区分君臣父子、君子小人、上智下愚、劳心劳力的旧礼制,还能有存在的余地吗?所以,当一位现代新儒家硬说“礼对个人不是一种外加的束缚,而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渠道”时,我们便一方面同多数专家一样,发现他“已把古书曲解到了无可容忍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窥见了他为现存等级制度回护的良苦用心。对这位现代叔孙通的学术观点,海外早有争议,国内却一直将其奉为上宾。

据说,中国经济已出现了腾飞,排到了全世界的第二位。倘果真如此,就应加快制度创新,争取政治、经济双赢,早日实现国人百余年的现代梦。可是,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在经济崛起的同时,文化复古主义却开始大行其道。除现代新儒家受到热捧外,大陆土生土长的几个弄潮儿更是独领风骚。他们或者主张“以孔子为代天受命制法施教之王者”,借此“恢复三纲”,并声言不放弃“对权力的

追求”，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或者把民主看作“祸国殃民的选择”，建议推行“儒化”，“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儒教国”；或者鼓吹幸福、快乐“与贫富无关”，把政府应取信于民曲解为“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劝诱贫贱者当自足；等等。难怪李零教授会说其“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仔细推求，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五四新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渴望现代化的真诚，反而，却处处透露着对文化糟粕的嗜好及向既得利益阶层投靠的急切。健胜说：这些人的“逆现代性理念往往与其政治诉求关系密切”，故不可与现代新儒家“等而视之”。我认为，做出这样的切割，对认清大陆所谓儒学复兴派的本质将非常有利。

健胜担心“《论语》是否又会成为束缚或制约中国人思想的一个工具”，“是否又会以被尊奉的名义悬置为某种权力的象征”。基于这样的考量，他在对“以中西之间的通约性全面遮蔽古今之间通约性的认知思路”进行批评的同时，更反对“以中西之争掩盖古今之争的思维逻辑”；在承认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言自明”的前提下，更反对把特殊性作为一种“自我异质”的借口，进而“抹杀人类在现代社会共同追求的诸如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取向”。对健胜的看法，我深表赞同，而且十分欣赏他敢于亮明观点的学术态度。因为如前所说，个别只是一般中的个别，而普世价值体现的却是时代精神，正像不能离开一般来谈个别一样，离开了普世价值，也就谈不上什么特色了。所以，无论怎样强调和维护自己的民族性，都不能削弱文化上的求同意识，更不能以复兴为名，重新为保守、落后撑起保护伞。健胜指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既需要因地制宜，更需要与时俱进。此论不仅允当，更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倡导的创新精神相符合。

健胜痛感于时下多数学者虽都支持文化多元论，但“当考量自身学术主张的现实价值时”，却“又不约而同地走向一元论”，缺少承纳不同见解的“学术气量”，故而他提出，应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以便各家各派相互交流和融通。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设想，但不免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健胜来自青海省边远的乡村，根子深扎在下层劳苦大众中。他以素朴之心揣度在儒家文化中打熬、历练出来的知识精英，所存的奢望似乎太高。更重要的是，个人和社会集团所认为的真理，都和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思想志趣、既得利益等密切相关，若无较为彻底的社会改造和制度转型，要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恐怕是既缺乏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也缺乏内在的自觉和动力。所以，我认为在坚持理解、同情和宽容的同时，批判仍

然不能丢。而健胜此书的缺点恰在于批判的力度稍弱。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健胜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未来的修订中予以弥补。我对健胜在学术上取得新的突破满怀期待。

是为序。

赵世超

2012 年 10 月于西安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论语》及其文本地位的历史流变	19
第一节 《论语》书名、编纂及其传本	19
一、《论语》书名及成书时间	19
二、《论语》的编纂：“子思编定《论语》”说质疑	23
三、《论语》的不同传本	30
第二节 《论语》文本地位的历史流变	34
一、传记作品身份下的《论语》	35
二、儒家经典身份下的《论语》	46
第二章 《论语》与“五四”	63
第一节 《论语》与“孔家店”	63
一、“五四”新文化派的相关言论	64
二、反对者的声音	68
三、时代回应与历史意义	72
第二节 胡适视域中的《论语》	80
一、从早期经历看胡适对《论语》的态度	81
二、胡适对《论语》的文本定位	85
三、胡适开创的新范式及其影响	93
第三章 《论语》与现代新儒学	100

第一节 熊十力与《论语》:《论语》在现代新儒学语境中的身份	
之一	101
一、熊十力对《论语》的文本定位及其变化	101
二、熊十力对《论语》相关内容的阐释	110
第二节 马一浮与《论语》:《论语》在现代新儒学语境中的身份	
之二	117
一、马一浮对《论语》的文本定位	118
二、《论语大义》的基本主旨	120
三、《论语大义》的诠释特点	125
第三节 冯友兰与《论语》:《论语》在现代新儒学语境中的身份	
之三	127
一、作为“哲学史史料”的《论语》	128
二、作为“新理学”材料的《论语》	133
第四节 钱穆与《论语》:《论语》在现代新儒学语境中的身份之四	141
一、钱穆对《论语》文本地位和研读方法的思考	141
二、钱穆对《论语》相关内容的阐释	148
第四章 《论语》在新中国的命运沉浮	161
第一节 “文革”前的《论语》研究	162
一、《论语》研究的一些进展	162
二、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及其阐释特点	164
第二节 当《论语》遭遇“文革”	176
一、“文革”中的“批孔”运动	177
二、真实的荒诞:《〈论语〉批注》内容举凡	179
三、《〈论语〉批注》的政治与人文语境	184
第三节 新时期的《论语》研究	187
一、“拨乱反正”后的反思与研究	187
二、《论语》注释范本:《论语译注》及其影响	193
三、“六经注我”式的典范型读本:《论语今读》及其“现代性”	203
第四节 “儒学热”、“读经热”背景下的《论语》阐释	214

一、“儒学热”、“读经热”的源起与演进·····	215
二、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及其论争·····	223
三、李零的两个《论语》读本及其论争·····	236
第五章 港台学者关于《论语》的文本定位·····	250
第一节 港台新儒家对《论语》的文本定位·····	250
一、牟宗三、唐君毅的相关认识·····	250
二、徐复观的相关认识·····	252
三、杜维明的相关认识·····	255
第二节 毛子水、林在勇、南怀瑾等对《论语》的文本定位·····	258
一、毛子水、林在勇、林安悟对《论语》的文本定位·····	259
二、南怀瑾对《论语》的文本定位及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	264
第六章 《论语》与中国的“现代性”·····	276
第一节 《论语》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现代性”·····	277
一、学术贡献与理论困境·····	277
二、不同的“现代性”想象·····	287
第二节 《论语》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292
一、如何推进“现代性”语境下的《论语》阐释·····	293
二、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	302
参考文献·····	313
后 记·····	327

导 言

一、本论题的研究意义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汇编,起初被视为儒家传记类作品的一种。两汉以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论语》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唐宋之时,《论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科举制盛行的明清时期,《论语》是儒学文本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经典。

首先,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经学体系的崩解,《论语》逐步失去了维持其经典地位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其所体现的儒学思想也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孔家店”^①的口号,《论语》也成为“五四”新文化派批判的对象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激进思潮视《论语》为导致中国落后的文化因素之一,批判、解构《论语》及儒学则被视为建构现代人文理念的一个前提。与此同时,胡适等人开始从“整理国故”的角度对《论语》和其他儒学经典展开研究,将《论语》与其他诸子作品等而视之,并力图消解《论语》和孔子的神性地位。

而在秉持文化保守立场的学者们看来,《论语》是中国人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主要精神资源,故而应当大力弘扬而非毁弃之。在众多文化保守派人士中,现代新儒家们不仅极力反对“五四”新文化派的观点,还纷纷著书立说,试图从《论

^① “五四”新文化派提出的“打孔家店”后讹变为“打倒孔家店”。参见宋仲福:《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考察》,《孔子研究》,1992年第2期。

语》等儒家经典中引导出“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理念。现代新儒学在民国初期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学术流派,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49年以后,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一般都活跃于港台地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港台新儒家开始在大陆进行学术活动,他们的主张也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儒学热”,大陆儒学复兴派们高举“复兴儒学”的大旗,利用网络、媒体及出版物等宣讲他们的“新儒学”理念。一些媒体还借着这股“儒学热”,开始炒作起《论语》来。蔡尚思先生曾说:“古来为中国任何一本古书注释的人都没有比《论语》更多的了。单这一点,就可以想见‘孔子迷’、‘《论语》迷’了。也是任何一个‘孔子迷’、‘《论语》迷’所无法一一拜读的。我敢断言:这种‘迷’,今后学者应当越来越少的,也必然会越来越少的。”^①但是,现实情况与蔡先生的“断言”似乎是相悖的。时下,各个大学纷纷开设《论语》讲读课程,种类繁多的《论语》释读文本纷纷登上图书热销榜,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加入炒作《论语》的行列,《论语》又成为人们热捧的“经典”。

综观近一个世纪以来《论语》沉浮不定的历史命运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成因,笔者发现,《论语》的现当代阐释史及其命运沉浮细致而微地体现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过程,它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想中的“现代性”。

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历程是学术界普遍重视的一个学术命题,探讨这一问题的学术成果也很丰富。由于受制于史学领域内某些既定的研究模式和话语形态,相关的研究要么服务于现实需要而普遍存在“以论代史”的倾向,要么牵缠于宏大叙事而缺少缜密细致的推敲,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干脆把这一“现代性”建构历程当作后现代主义史学方法的实验场,纷纷解构起还未真正得以实践的“现代性”理念来。笔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而如何建构起适宜的“现代性”则首先是一个学术问题,所以说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首先表现为学术思想的现代化,考察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也应当把注意力集中投放到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想的“现代性”这一问题上。

学术思想的“现代性”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也不是罗列不同学派的主张之后去判别谁更具有“现代性”的问题。换言之,要想考察特定期学术思想的

① 蔡尚思:《论语导读》,《蔡尚思全集》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86页。

“现代性”问题,就要研究这一时期不同学派的学术主张形成的内在过程。综观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想史,虽然经学体系早已崩解,但与之有关的问题仍然是学术界关心和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儒家经典的现代意义曾一度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历数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不管是“五四”新文化派,还是现代新儒学,以及近年来活跃于大陆学术界的儒学复兴派及其反对者,都不同程度地讨论过《论语》的文本地位、思想内涵及其现代意义等问题,他们关于《论语》的问题意识也与他们对“现代性”的看法密切交织在一起。如果把这些学派和相关学者的看法整合到一起去分析,他们有关《论语》的研究成果是考察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想的“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的一个非常适宜的角度,而在上述有关问题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往世经典与现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张力与互动,都是本论题的首要研究意义所在。

其次,笔者认为,以特定文本的阐释史为中心的研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方法。关于儒学思想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也有过相关的研究。其中,有些具有通史风格的研究模式一味地强调这一时期不同学派及其思想观念的更迭与发展,甚少考虑到特定学派的思想视域及其问题意识的成因。这种点将排名式的研究与写作模式,既无法体现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基本面貌,更不能真正体现中国社会缓慢而微妙的“现代性”建构历程及其内在成因。还有一些研究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比如王锬先生的《孔子与20世纪中国思想》^①和林甘泉先生的《孔子与20世纪中国》^②。他们的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研究模式的局限,但往往将孔子的历史形象及其嬗变过程看作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问题,在解释孔子的形象为何发生嬗变或者嬗变的内在依据等问题时,他们的研究方法又成为解答这些问题的一个掣肘,使结论显得浮泛而笼统。

笔者认为,分析《论语》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地位、影响及其被不断诠释的历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达成对特定思想原型的解读与回顾,更为关键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体察不同学派或不同学者,在建构“现代性”这一总的问题意识下形成各自不同的观念与主张的文本基础与内在缘由。考察不同学派或不同学者

① 王锬:《孔子与20世纪中国思想》,齐鲁书社,2006年版。

② 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对《论语》的文本定位和思想阐释,也意味着要探究相关学术活动的深层问题,从而可以避免将某一“学派”简单化为某某“主义”的贴标签式的研究缺陷。与此同时,通过《论语》与“现代性”语境恰如其分的联结,我们还可以对现当代中国总体的“现代性”观念进行分析和把握。

最后,本论题的研究意义还在于填补了《论语》当代阐释史的学术空白。近年来,儒学很热,《论语》也很热。有些学者四处演讲、著书立说,目的是为了这股“儒学热”变得更为炽热,而有些学者的研究则是为了冷静地反思当前的复古热潮。由于他们秉持的“现代性”理念各不相同,这些学者之间有时会为此而大打笔仗。这些学者们的《论语》阐释文本和相关学术论著,以及与之有关的学术讨论,都是构成《论语》当代阐释史的基本材料。《论语》的当代阐释史是《论语》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若系统地考察上述材料,就可以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目前为止,学术界有关本论题的研究虽没有成体系的作品问世,但相关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前文所述,与本论题类似的研究成果有王锬先生的《孔子与 20 世纪中国思想》和林甘泉先生的《孔子与 20 世纪中国》。由于《论语》和孔子密不可分,故而上述二位学者的研究也部分地涉及了本论题重点讨论的问题。高瑞泉先生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①一书,从“现代性”谱系中的民主、自由、科学等理念出发,对现代中国的精神传统作了梳理和评估。此书的重点在于分析中国“现代性”的观念谱系,并没有考察形成或负载这些观念的文本资源。此外,方克立先生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②一书,对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有过探讨,但是没有涉及现代新儒家们对《论语》的文本定位和思想阐释。与本论题相关的“《论语》学”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其中,唐明贵先生的《〈论语〉学的形成、发展

① 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

②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长春出版社,2008 年版。

与中衰》^①一书,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论语》学史有过详论。柳宏先生的《清代〈论语〉诠释史论》^②一书,专门探讨了清代《论语》的诠释史,此书对清末《论语》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对笔者助益较大。刘斌先生的《民国〈论语〉学研究》^③,对民国《论语》学史也作了专题研究,刘斌先生的研究虽属于《论语》学范畴,并未直接探讨《论语》与“现代性”的内在关系,但对笔者的相关研究也多有助益。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者们对与本论题相关的问题有过一些探讨。如郑大华先生的《“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的运动吗——兼与林毓生教授商榷》^④,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⑤,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诠释》^⑥,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⑦,李慎之先生的《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⑧,杜维明、陈振江二位先生的《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杜维明、陈振江教授对谈录》^⑨,林存光先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孔子观念的根本转折》^⑩,郑大华、周元刚二位学者的《“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⑪等,上述论著有些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意义的系统研究成果,有些是对特定问题的专门分析,其中一些是关于“五四”运动及其历史正当性问题的针锋相对的论辩。杨念群先生的《“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⑫一文是近年来重新解读和阐释“五四”的力作,对笔者多有启示。此外,宋仲福先生的《关于“打倒

① 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柳宏:《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刘斌:《民国〈论语〉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未刊。

④ 郑大华:《“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的运动吗——兼与林毓生教授商榷》,《求索》,1992年第4期。

⑤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⑥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⑦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同舟共济》,2001年第4期。

⑨ [美]杜维明、陈振江:《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杜维明、陈振江教授对谈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⑩ 林存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孔子观念的根本转折》,《孔子研究》,2004年第3期。

⑪ 郑大华、周元刚:《“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

⑫ 杨念群:《“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